

合法性权力视域下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张娟娟

摘 要：民兵是一种特殊的非正规武装力量，广泛存在于动荡国家或转型国家，在国内和地区安全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伊拉克战后初期，国家处于政治低效和军事软弱状态。什叶派民兵组织乘机跻身国家政治体系，通过维护安全秩序、分担治理责任和助力社会重建，弥补国家政治和军事职能的缺失，获得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动员力量。什叶派民兵合法性权力的扩展威胁到巴格达的政治和军事最高权威，影响了战后国家—社会关系和地区安全形势，迫使政府着手调整与之关系。未来，伊拉克在推动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时，既要协调权力集中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也要维系美伊（朗）博弈与国家主权的平衡，以服务国家治理和战后重建。

关键词：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合法性权力；权力整合；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张娟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19级博士研究生（西安710127）。

文章编号：1673-5161(2022)01-0097-20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2015年度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伊斯兰教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2015ZD003）的阶段性成果。

21 世纪以降,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新月”势力不断巩固,什叶派民兵逐步上升为影响中东教派冲突、美伊(朗)博弈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新因素。其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位于中东什叶派和逊尼派阵营对抗的“中间地带”,是伊拉克国内和地区政治的重要变量之一。2003 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国家权力衰微,部落力量和教派势力重新崛起。什叶派民兵迅速渗入政治和社会领域,在国家重建和反恐行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武装力量的上升和地区权力的扩散不可避免地给伊拉克的内政外交增添了隐患。为整合国家权威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巴格达历届政府将解除武装(disarmament)、复员(demobilization)和重返社会(reintegration)列为施政重点之一。

2014 年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行动打断了伊拉克国家主导的民兵复员进程。反恐行动胜利后,“人民动员部队”(al-Hashd al-Sha'abi 或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拒绝卸下武装,个别亲伊朗的激进什叶派武装民兵煽动社会抗议、制造暴力冲突、参与跨国军事行动,对伊拉克国家和地区安全持续构成威胁。总体来看,什叶派民兵重返社会计划多次陷入停滞表明,新政府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或完全取代民兵力量。2020 年 5 月,无党派人士、伊拉克国家情报局前局长穆斯塔法·卡迪米(Mustafa al-Kadhimi)接任总理,着力于集中国家的合法性权力和加强国家的治理能力。卡迪米在其就职声明中表示将“恢复巴格达中央政府持有武器和使用武力的专属权(垄断暴力使用权),消除目前伊拉克多个权力机构的‘帮派状态’”^①。

有鉴于此,本文借用“合法性权力”这一概念,通过追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合法性权力的变迁过程、什叶派民兵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探讨战后伊拉克整合什叶派民兵的合法性权力、重塑国家—社会关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促进社会稳定与地区和平的相关努力和现实困境。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议题

在当代中东,什叶派民兵特指信仰什叶派伊斯兰教、以什叶派政治势力或宗教团体为基础建立的非政府武装力量。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特殊性在于其拥有强大的民众合法性、追求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议程、积极参与国家正式机构,并且在多个层面获得了合法性权力,因而超越了传统民兵的范畴。溯其根源,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崛起不仅受到地区什叶派伊斯兰革命的助力,更顺应了伊拉克国家政局变动的主流趋势。因此,从单一方面解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合法性权

^① Yaron Schneider, “Tightrope over the Tigris: Iraqi Prime Minister Reins in Iran-Backed Militias,” *INSS Insight*, No. 1351, July 22, 2020, p. 2.

力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都是不充分的。

(一) 什叶派民兵相关概念及其内涵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属于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追随特定的什叶派宗教领导人,或以个别什叶派大家族为基础形成宗教政治网络。与世俗民兵相比,什叶派民兵多出一层宗教属性,时刻彰显其教派特征。这一信仰属性助力什叶派民兵顺利进入战后国家政治体系,并获得了什叶派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第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基本类别及差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成员阶层和经历各异,因而在宗教倾向、政治理念和社会行动上表现略有不同。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本土派”“萨德尔运动”(Sadr Movement)附属的“马赫迪军”(Jaysh al-Mahdi)和“流亡派”“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fo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以下简称“伊革委”)^①附属的“巴德尔组织”(Badr Organization)。前者秉持民族主义,代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排斥“伊斯兰达瓦党”(Hizb al-Dawa' al-Islamiyya)^②和伊革委等从国外返回的政治组织,主张由“本土派”掌权。后者代表中上层阶级的利益,积极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希望国家尽快恢复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尽管各民兵组织间分歧严重、龃龉不断,但都对什叶派掌握国家领导权充满热情。大部分什叶派民兵与伊朗关系密切,其中“流亡派”长期受德黑兰的政治扶持、经济资助和军事训练,部分领导人认同伊朗的法基赫体制,视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为“效仿源泉”。

第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合法性权力。从本质上讲,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一种社会力量的表现形式,填补了国家势力尚未触及的领域,扮演了国家难以扮演的角色,从而获得了政治、社会和宗教三个层面的合法性权力。在政治层面,什叶派在2005年议会选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巴德尔组织和马赫迪军分别凭借其政治团体伊革委和萨德尔运动进入“临时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管会”),相继成为伊拉克团结联盟(United Iraqi Alliance)^③的成员。在社会层面,战后伊

^① 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是伊拉克最大的什叶派政党,拥有强大的组织系统,倡导实用主义,其领袖出自纳杰夫的哈基姆家族。伊拉克战争后,伊委会回国并成为执政党,与美国、伊朗保持盟友关系,是萨德尔运动最有力的竞争者。

^② 1957年“伊斯兰达瓦党”建立。该党旨在促进什叶派宗教实践的复兴和什叶派伊斯兰法律的实施,被视为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母党”。参见 Kirk H. Sowell, “The Rise of Iraq’s Militia Stat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3, 201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59888>, 上网时间:2020年7月12日。

^③ “伊拉克团结联盟”(United Iraqi Alliance)囊括了萨德尔运动以外的什叶派政治组织,在2005年的两次选举中均获得绝对多数选票,确立了什叶派的政治主导地位。参见 Kenneth Katzman, *Iraq: Elections,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November 20, 2006, p. 6; Shaheen Mozaffar, “Elections, Violence and Democracy in Iraq,” *Bridgewater Review*, Vol. 25, Issue 1, 2006, pp. 5-9。

拉克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弱化,什叶派民兵则凭借自身优势主动参与社会治理,赢得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在宗教层面,伊拉克各什叶派民兵为更好融入政治进程,刻意淡化各自的伊朗背景,转向纳杰夫。伊革委和萨德尔运动积极搭建社会和宗教服务网络,并以明确的政治纲领促进伊斯兰主义的复兴,获得了西斯塔尼等宗教精英的认可和支 持。

第三,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与国家关系。战后初期,整个伊拉克尚处混乱之中。联军和伊拉克新政府赋予什叶派民兵组织持有武器装备、保卫地方安全及管理社区的合法权力,但却侵蚀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导致国家直接控制和动员社会的难度上升。什叶派民兵与国家二者间的关系并非绝对“零和”或是“争夺代理权的斗争”,^①而是处于互有竞争、相互赋权的动态博弈过程。首先,民兵是国家治理的补充力量,^②而民兵势力的崛起势必威胁到国家权力的集中,尤其在国家安全机构力量式微之际,民兵俨然挑战了国家“垄断暴力”的权威。其次,在美国和伊朗势力长期存在和博弈的情况下,什叶派民兵则成为伊拉克政府平衡地区秩序、施展外交技艺的“合作伙伴”,帮助政府在美伊(朗)博弈的夹缝中寻求政治外交的平衡。最后,在“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蔓延之时,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以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担纲了国家的“保护”角色,缓解了政府的治安和政治压力,同时国家也不得不受民兵及其背后势力的掣肘。概言之,这一对矛盾关系反映出伊拉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尽管什叶派民兵是伊拉克战后的一个关键角色,但也是研究相对贫乏、定义最为模糊的武装类型之一。近年来,学界常以“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审视战后伊拉克的政治社会治理、教派冲突、军队建设与战后重建问题。^③论及什叶派民兵,常作为伊拉克战后政党的辅助力量,^④或被直接归入“亲伊朗派”和“伊朗代理

① [美] 乔尔·S. 米格代尔、[美] 阿图尔·柯里、[美] 维维恩·苏:《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郭为桂、曹武龙、林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 页。

② Corinna Jentsch and Stathis N. Kalyvas, “Militias in Civil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9, No. 5, 2015, p. 764.

③ 黄民兴:《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根源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03 年第 6 期;刘月琴:《伊拉克战后重建及问题》,载《西亚非洲》2004 年第 1 期;韩志斌:《伊拉克教派结构与政治分裂危机》,载《西亚非洲》2006 年第 9 期;王丽影、王林聪:《伊拉克国家重建困境的根源及出路》,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 3 期;魏亮:《浅析美军撤离后伊拉克政治重建的安全环境》,载《西亚非洲》2012 年第 4 期;朱泉钢:《论伊拉克国家重建中的军队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 年第 4 期;朱泉钢:《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以埃及、伊拉克、也门、黎巴嫩等共和制国家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王丽影:《试析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制约因素: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载《中东研究》2018 年第 2 期。

④ 汪波:《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政党政治发展》,载《西亚非洲》2007 年第 4 期。

人”行列。^①相对而言,西方学者对什叶派民兵合法性及其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大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定义什叶派民兵及其合法性权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暴力形式,通过塑造自己的“防御者”和“守护者”形象,在社会暴力风险持续走高和国家无政府状态之时积极融入政治,成为独立于中央的一股社会力量。^②同时,它们类似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运动”(sociopolitical movements),享有广泛的合法性权力,深度介入社会和政治领域,^③从而获得了“借来的合法性”(borrowed legitimacy)。^④事实上,什叶派民兵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运动或社会政治运动,它们是在既有的什叶派家族或宗教政治团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伊斯兰社会运动,本身具备社会动员能力和政治组织基础。而20世纪中期以来什叶派政治运动和教派主义的长足发展,也为什叶派民兵获得合法性权力奠定了基础。

第二,关注什叶派民兵与伊拉克国家间的关系。战后,什叶派民兵通过承担部分社区安全和社会服务责任,填补了中央政府社会职能的缺失。^⑤国家长期依赖民兵的同时又受其掣肘,导致国家合法垄断暴力和控制社会的基础性权力^⑥虚弱。在战后国家机构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宗教和地方组织通过提供“非国家福利”构筑其政治支持网络。长此以往,国家势必要重新整合合法性权威,修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明确的是:什叶派民兵与国家的关系并非一直处于线性发展和稳步上升的态势,而是一个依赖与竞争同在的矛盾过程。

① 陈翔:《伊朗介入中东地区事务的动力及限度》,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1期,第46页。

② David Ucko, “Militias, Tribes and Insurgents: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Reintegration in Iraq,” *Conflict,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8, No. 3, 2008, p. 346.

③ Ches Thurber, “Militias as Sociopolitical Movements: Lessons from Iraq’s Armed Shia Groups,”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5, Nos. 5–6, 2014, p. 901.

④ “借来的合法性”不同于常说的“合法性”,其与“合法律性”无关,也非“选举产生”,而是指社会实践的“有效性”。参见Ulrich Schneckener, “Militias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cy,”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8, Nos. 4–5, 2017, p. 800.

⑤ Fanar Haddad, “Sectarian Relations in Arab Iraq: Contextualizing the Civil War of 2006–2007,”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2, 2013, p. 117.

⑥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将国家权力分为“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即“渗透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两个维度。前者指在不与社会团体进行例行、制度化协商的情况下,国家精英阶层可以行使的权力范围;后者指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渗透公民社会以及在逻辑上贯彻政治决策的能力。参见[美]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第二卷·上),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John A. Hall, ed., *States in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 11.

第三,重视什叶派民兵复员和融入社会的前景。有学者认为,后“伊斯兰国”时代的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继续持有武器,并在意识形态和军事行动上紧随伊朗。^① 这一论述忽略了什叶派民兵已基本完成“温和派”和“激进派”分化的事实。主流什叶派民兵如巴德尔组织和马赫迪军已然步入政治轨道,而部分激进什叶派民兵继续辗转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地区,发起暴力活动,牵动着伊拉克政府的外交定位和中东地区安全形势。^② 概言之,整合什叶派民兵的合法性权力对伊拉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③ 但是,有针对性地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对伊拉克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过程。

二、驯服民意：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合法性权力的获取路径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正式发迹于反萨达姆的政治斗争,或参加国内伊斯兰运动,或受伊朗支持,成功实现了组织化和政治化运作。伊拉克战后初期,什叶派民兵广泛参与社会重建,赢得什叶派民众和宗教精英支持,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民众向心力,成为与中央政府共存的社会政治力量。

(一) 反萨达姆斗争与伊朗支持

伊拉克什叶派长期处于国家政治体系的边缘。20 世纪中后期,伊朗什叶派乌莱玛阶层挺进政治,激发了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热情。萨达姆政府深感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威胁,着手推进“去伊朗化”政策。1971 年,复兴党政府血腥镇压什叶派宗教和社会运动,驱逐伊朗侨民以及有伊朗血统的伊拉克居民,^④ 大量什叶派政治组织和民兵团体随之涌现。

“萨德尔运动”作为“本土派”什叶派民兵的主要代表,其理论奠基人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Muhammed Baqir al-Sadr)在政治上拥护霍梅尼的“教法学

① Jonathan Stevenson, “Shia Militias in Iraq,” *Strategic Comments*, Vol. 23, No. 3, 2017, pp. 1-2; Beston Husen Arif, “Iran’s Struggle for Strategic Dominance in A Post-ISIS Iraq,” *Asian Affairs*, Vol. 50, No. 3, 2019, pp. 4-12.

② Norman Cigar, *Iraq’s Shia Warlords and Their Militia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Option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 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June 2015.

③ Thomas S. Mowle, “Iraq’s Militia Problem,”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48, No. 3, 2006, p. 3.

④ 王宇洁:《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4 页。

家治国”思想^①,鼓励什叶派穆斯林参与伊斯兰革命^②。1980年6月,萨达姆处决巴基尔·萨德尔激起了什叶派穆斯林的武装反抗。^③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Muhammed Sadiq al-Sadr)^④继承其兄巴基尔的政治遗产,借助什叶派民众的愤怒情绪吸引追随者、抨击复兴党,号召在伊拉克打造类似于伊朗的伊斯兰政权。萨迪克要求追随者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生活,其思想迎合了底层什叶派民众的心理,吸引了大量处于经济困境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尔后,“萨德尔运动”在1991年的什叶派起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迅速成长为伊拉克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伊斯兰运动。1999年2月19日,“萨德尔运动”遭到严厉打压。萨迪克及其两子遭复兴党暗杀,三子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长期被软禁。^⑤萨德尔党人被迫转入地下运营,直到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才重新崛起。

1982年11月17日,“流亡派”代表人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基姆(Mohammed Baqir al-Hakim)^⑥在伊朗的支持下建立了伊拉克境外最大的反萨达姆组织“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次年,伊革委聚集流亡者建立民兵组织“巴德尔旅”(Badr Brigade)^⑦负责伊革委的情报和军事事务,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军事训练和经济资助。^⑧据伊革委报道,1986年军团战士有1万至1.5万人,但外界认为其规模不超过3,000至4,000人。^⑨随着巴基尔·哈基姆

^① Muhammad Baqir as-Sadr, *Lessons in Islamic Jurisprudence*, Roy Parviz Mottahedeh, trans., Oxford: Oneworld, 2003, p. 32.

^② Al-Sayyid Abu al-Qasim al-Musawi al-Khu'i, *The Prolegomena to the Qur'an*, Abdulaziz A. Sachedina,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

^③ T. M. Aziz, "The Role of Muhammad Baqir Al-Sadr in Shi'i Political Activism in Iraq from 1958 to 198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5, No. 2, 2009, p. 214.

^④ 萨迪克·萨德尔曾师从巴基尔·萨德尔、巴基尔·哈基姆(Baqir al-Hakim)以及霍梅尼等著名什叶派宗教学者,34岁即成为一名“穆智台希德”(mujtahid)。但萨迪克的宗教威望远不及胡伊(Abdul-Majid al-Khoei)、西斯塔尼和哈基姆等人。他是通过继承堂兄巴基尔的宗教声望和政治遗产,才确立了自己在什叶派基层社会的地位和支持网络。参见 Ches Thurber, "Militias as Sociopolitical Movements: Lessons from Iraq's Armed Shia Groups," p. 907.

^⑤ Ibid., p. 908.

^⑥ 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基姆(Muhammad Baqir al-Hakim)是伊拉克著名的大阿亚图拉穆赫辛·哈基姆(Muhsin al-Hakim)之子,在2003年8月纳杰夫的炸弹袭击中遇难。参见 Juan Cole, "Shiite Religious Parties Fill Vacuum in Southern Iraq,"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 April 22, 2003, <https://merip.org/2003/04/shiite-religious-parties-fill-vacuum-in-southern-iraq/>, 上网时间:2020年9月30日。

^⑦ 该组织后发展为“巴德尔军团”。

^⑧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hiite Politics in Iraq: 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ncil*, Middle East Report No. 70,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07, p. 2.

^⑨ 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4页。

垄断权力,伊革委实际上成为哈基姆家族的政治组织。^① 1991 年起义期间,哈基姆曾派巴德尔军团潜入伊拉克南部地区发动“伊斯兰革命”。^② 这一行动不仅违背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意愿,而且招来了萨达姆的疑惧和血腥镇压,致使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运动几乎陷入停滞。

总体来看,“本土派”和“流亡派”什叶派民兵组织均以家族和宗教追随网络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政治组织。尽管各派政治思想倾向不同,发展道路各异,且互有竞争,^③但都在反萨达姆的政治斗争中实现了蜕变,成为推动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组织化和政治化的主力军。

(二) 参与国家重建兑换合法性

什叶派民兵通过融入政治进程、调整定位、参与社会安全重建和团结纳杰夫什叶派宗教精英等方式,参与战后伊拉克国家重建,争取自身合法性。

首先,融入新的政治进程。2003 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推翻了萨达姆和复兴党的统治。4 月 16 日,伊革委等“流亡派”政党和民兵组织纷纷回国。7 月,伊革委借助什叶派宗教精英和美国的扶持,进入临管会并获得了 1 个席位^④。在 2005 年 12 月的议会选举中,伊革委与巴德尔组织共获得 36 个席位,据有内政部和财政部部长之职,控制了多个省份的政治和安全机构。为尽快融入战后政治体系,伊革委于 2007 年 6 月转向务实主义(机会主义),强调其与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关系,去掉“革命”一词,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最高理事会”(以下简称“伊委会”),以表明《伊拉克宪法》已经取代“革命”的需要。

萨德尔运动则另辟蹊径,反对美国占领、拒绝与当局合作,固守民族主义路线以赢得政治与社会合法性。美国怀疑萨德尔党人的宗教倾向,宣布马赫迪军是“应该被遏制或消灭的军阀”^⑤和刺杀阿亚图拉·胡伊(Sayyid Abul-Qassim al-Khoei)、哈基姆的凶手,并将其排除在联盟临时权力机构之外。2004 年 3 月,

① Amatzia Baram, “Two Roads to Revolutionary Shi’ite Fundamentalism in Iraq,”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s: The Dynamic Character of Movemen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548.

② 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第 90 页。

③ Ches Thurber, “Militias as Sociopolitical Movements: Lessons from Iraq’s Armed Shia Groups,” p. 906.

④ 25 位伊拉克主要政治领导人中有 13 位是什叶派。David Gairdner, *Risk and Violence in Iraq’s New Sectarian Balance*, NOREF Report, Norwegian Peacebuilding Resource Centre, September 2012, p. 3.

⑤ Paul Bremer and McConnell Matthew, *My Year in Iraq: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Future of Hop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6, p. 129.

布雷默以“煽动暴力”^①为由查封萨德尔运动的宣传刊物《侯扎报》(Al-Hawza),引发了两轮大规模军事冲突。直至10月,美军未能如愿拔除萨德尔势力及其马赫迪军队,被迫承认萨德尔运动的政治地位,允诺以政治参与权换取停火。萨德尔派候选人在2005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23个席位,12月增至32席,继而进入伊拉克团结联盟和国民议会,控制了卫生部和交通部。

其次,调整定位并争取合法性。战后,联军协助重整伊拉克的军事力量,禁止国家武装力量之外的其他组织拥有重型武器,禁止个人在公共场所携带小型武器(不包括处于联军监督下的武装组织)。^②终因联军无法维持战后的社会秩序,新军队尚未组建完善,遂又改变态度。2004年,布雷默正式授予民兵组织在承担地方安全责任时拥有与联军同等的权力。12月,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允许民兵组织葆有武装,并继续在民间发挥作用。2005年10月15日,《伊拉克宪法》允许各地区在国家重建初期保留那些建立在政治势力或种族派别基础上的民兵武装。^③2005年至2006年,巴德尔旅接受整编,部分战士被招募进警察局、政府武装或国家安全部队。^④2007年,亲伊朗的巴德尔旅在美国的压力下更名为“巴德尔组织”^⑤,宣布放弃重型武器,保留1万名武装人员,将目标设定为“维护人道主义、恢复安全和建设新的伊拉克”^⑥。同样,穆克塔达为了更好地延续其政治合法性,将反美策略由“武装抵抗”改为“政治抵抗”。^⑦

再次,参与社会安全重建。由于美国推行的全面“去复兴党化”政策^⑧缺乏组织化的解除武装和复员规划。2003年5月23日,联军正式解散伊拉克军队,导致大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和携带武器的前复兴党军人流入社会,形成潜在的暴

① 2004年3月,萨德尔发表讲道,宣称“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奇迹,是上帝的祝福”。参见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uqtada Al-Sadr: Spoiler or Stabilizer?*, Middle East Report, No. 55, July 11, 2006, p. 11。

② 汪波:《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政党政治发展》,第7页。

③ 黄民兴:《中东历史与现状二十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30-231页。

④ Kenneth Katzman, *Iran-Iraq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ugust 13, 2010, p. 1.

⑤ Mahan Abedin, “The Supreme Council fo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 *Middle East Intelligence Bulletin*, Vol. 5, No. 10, 2003, http://www.meib.org/articles/0310_iraqd.htm,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20日。

⑥ W. Andrew Terrill,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q's Shi'ite Clergy: Partners or Adversaries?*, Carlisle: U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4, p. 26.

⑦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uqtada Al-Sadr: Spoiler or Stabilizer?*, p. 12.

⑧ 2003年5月,联盟临时当局负责人保罗·布雷默为肃清萨达姆政府“余党”,推出两项决议:一是宣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非法组织;二是解散国防部和内政部。

力威胁,本土安全部队难以有效控制社会势力。^① 伊拉克陷入失序、暴力、公开犯罪和有组织的叛乱。仅在 2004 年 9 月,伊拉克境内就发生了 35 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② 混乱中,什叶派民众高度依赖什叶派民兵组织,将其视为安全和经济援助的唯一来源,这一“社会忠诚”在后续的宗派对抗中不断强化。阿里清真寺爆炸案发生后,什叶派民兵组织向社会提供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抵抗逊尼派的暴力活动并保障民众安全。2006 年 11 月 23 日,萨德尔市的爆炸袭击造成约 200 人死亡,马赫迪民兵积极平息动乱、参与救援、提供医疗救助,“承担事实上的政府角色”。^③

最后,团结纳杰夫什叶派宗教精英。西斯塔尼等宗教权威人士倡导将什叶派的政治原则与美国在伊拉克建立的民主计划相协调,^④这与什叶派民兵倡导的保守伊斯兰主义不谋而合。伊革委历来重视与伊拉克什叶派宗教界修好,巴德尔组织在战乱期间向宗教圣城提供安全保护,成为西斯塔尼的盟友。尽管萨德尔运动与西斯塔尼在对待美国等问题上意见相左,但西斯塔尼仍然将萨德尔运动与马赫迪军视为抗衡“逊尼派叛乱分子和外来‘圣战’组织”的重要合作伙伴,多次庇护遭美国和过渡政府打压的萨德尔党人。

总体来看,什叶派民兵合法性权力的获取不仅归因于伊拉克国家政治形势剧变所造就的一系列历史机遇,也得益于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长期淬炼。然而,国家与民兵之间的权力博弈是现代民族国家权力过渡的必然过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合法性权力也难逃其历史宿命。

三、合法性权力博弈：国家与什叶派民兵的互动关系

从威权政府过渡到民主重建,伊拉克什叶派政党的治理能力明显不足。部落力量、教派民兵和社会组织蜂拥而起。新政府缺乏在其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威,不得不依赖民兵维持社会秩序。而当国家政权初步实现制度化之后,民兵则成为妨碍国家最高合法性权威的存在。因此,转移什叶派民兵的

^① *Iraq in Transition: Post-Confli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pen Society Institut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 2004, p. 31.

^② Toby Dodge, “Iraq: The Contradictions of Exogenous State-Build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7, No. 1, 2006, pp. 192–193.

^③ Hannes Berts, “Non-state Armed Group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ome Legal Aspects of Engaging with Non-State Armed Group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wed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Swedish*, Spring 2005, pp. 46–47.

^④ Juan Cole, “The United State and Shi’ite Religious Factions in Post-Ba’thist Iraq,”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47, No. 4, 2003, pp. 543–566.

社会和政治合法性是伊拉克重建战后社会秩序、强化国家权力、重塑政府角色并修正国家—社会关系的基础。

(一) 什叶派民兵的权力扩张与政府的整合行动

战后初期,伊拉克什叶派政党初掌权柄,国家机构尚未建设完善,政府的社会影响力有限。什叶派民兵则游走于政府和民众之间,充当国家与人民的“联系人”。^① 2005年1月,伊拉克官方宣布议会选举结果。逊尼派不满什叶派占据绝对多数席位而发动骚乱,教派暴力事件频发。次年7月,宗派冲突升级,小布什与马利基政府制定的新安全计划遭遇失败。^② 为限制暴乱,联军授予什叶派民兵维持地方治安的合法性权力。

起初,什叶派民兵在各自控制区内的治理卓有成效,社会安全形势见好。但随着民兵权力的扩大,腐败横生。掌控内政部的伊革委利用职权调用安全部队保卫什叶派社区,无视逊尼派民众的危险处境,^③引发诸多不满,迫使逊尼派组建自己的民兵武装保护社区安全。^④ 同时,什叶派民兵重点压制宗派主义活动,加剧了种族间的暴力程度。^⑤ 激进什叶派民兵甚至不惜制造宗派间暴力^⑥来刺激什叶派民众的依附心理以收取“保护费”。巴德尔组织的几个精英突击队突袭逊尼派住宅区,骚扰平民,动用酷刑和非法暗杀,犯下人道主义罪行。^⑦ 2006年2月,阿里·哈迪清真寺爆炸事件后,马赫迪军队以打击恐怖势力为名占领社区,暴力威胁、恐吓并驱逐逊尼派民众,乘机偷盗和抢劫财物。^⑧ 考克伯恩评价其“用一种警察无法做到的方式来保证民众安全”。^⑨

① Faleh A. Jabar,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LSE Middle East Centre Paper Series*, No. 25, 2018, http://eprints.lse.ac.uk/88294/1/Faleh_Iraqi%20Protest%20Movement_Published_English.pdf,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6日。

② 新计划主要是投入更多的美军专家协助培训伊拉克安全部队,重新部署巴格达周围的美军。

③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Next Iraqi War? Sectarianism and Civil Conflict*, Middle East Report No. 52, February 27, 2006, pp. 17–21.

④ Megan K. Stack, “Neighborhood Militias Add Another Armed Layer,”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 2006.

⑤ United States Embassy to Iraq, “Provincial Stability Assessmen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06, <https://www.nytimes.com/2006/04/09/washington/world/the-reach-of-war-frictions-us-study-paints-somber-portrait.html>,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5日。

⑥ Andrew Hubbard, “Plague and Paradox: Militias in Iraq,”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18, No. 3, p. 348;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uqtada Al-Sadr: Spoiler or Stabilizer?*, p. 23.

⑦ Ellen Knickmeyer and Omar Feki, “Sunni Arabs Tell of Abuse at Secret Iraqi Priso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6, 2005.

⑧ 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第140页。

⑨ Patrick Cockburn, *Muqtada: Muqtada Al-Sadr, the Shia Revival, and the Struggle for Iraq*, New York: Scribner, 2008, p. 154.

尔后,什叶派民兵组织之间因内斗频繁,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整合之。2007 年 9 月,马赫迪军与伊委会在卡尔巴拉激烈交火,伤及多名朝觐人员。混乱无序和无政府状态之下,部分什叶派民兵组织乘机对伊拉克安全部队和美国军队发动暴力袭击,打破了国家与民兵之间长期以来的依赖关系。政党化的什叶派民兵进一步挑战马利基政府的权威,迫使后者将解除民兵武装列为优先事项。2008 年,伊拉克安全局势改善,平民伤亡率大幅下降,马利基乘机整治萨德尔运动以提高政府的威望。马利基政府军在美军的协助下击退马赫迪军,并在巴士拉等地区扶持亲政府的部落委员会、发放救援物资、提供食品药品和就业岗位,^①赢得南部广大什叶派民众的支持。2009 年 1 月 31 日,在伊拉克 14 个省的地方选举中,马利基政府收获多数南方省份的选票,不仅力压萨德尔运动,也削弱了伊委会的政治势力。

简言之,战后重建时期的伊拉克,从依赖民兵到规划民兵复员、限制民兵社会影响力的发挥,体现了国家与民兵互动关系的悖论性。同样,在什叶派民众看来,当民兵是提供安全和社会服务的唯一选择时,民众愿意暂时赋予其社会“合法性”,但当国家的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后,这种合法性权力随即失效。

(二) 国家推动复员进程以统合什叶派民兵力量

什叶派民兵权力的扩展进一步推动什叶派普通民众的部落和教派认同感加强,加剧“伊拉克国家主义”意识的退化。战后初期,新政府和联军主张解除民兵武装,推动其复员和融入社会,将什叶派民兵等社会力量纳入国家轨道。

2004 年,临管会推行的民兵复员方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个人身份将民兵编入安全部队,把其对民兵组织的服从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二是政府鼓励民兵退役,并由政府提供与正规军人等额的养老津贴;三是政府为民兵规划教育和职业方案。^②在实践中,原本规划的 5 年(至 2009 年完成)复员期限被大大压缩。联军要求民兵必须在当年 6 月底完成权力移交^③才可享受重返社会的福利,完全超出实际进度。6 月 1 日,仅有 9 个组织签署备忘录。7 日,联军临时当局发布《第 91 号法令》(CPA Order Number 91),设立“过渡和重返社会执行委员会”(Transi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ttee),明确指出伊拉克当时唯一合法的武装部队是伊拉克部队和联军,已签署过渡和重返社会协议的民兵属于“残余分子”,

^① Marissa Cochrane, *The Battle for Basra*,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May 2008, p. 23.

^②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Transition and Reintegration Strategy*, unpublished, May 21, 2004, pp. 7-14.

^③ *Series of Unpublished Memos from David Gompert to Paul Bremer*, June 1, 2004, 转引自 Thomas S. Mowle, “Iraq’s Militia Problem,”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48, No. 3, pp. 47-48.

须在 2005 年底前履行复员方案。^① 这显然不符合伊拉克的社会现实。

首先,该复员计划缺乏严格的制度保障,伊拉克也不具备支持职业化和教育计划实施的经济条件。其次,国防部将民兵视为“伊斯兰主义者”,拒绝将后者编入安全部队。再次,大多数民兵不能提供可以领取退休金的资质证明,^②更不信任政府和联军的承诺,拒绝提供复员名单或上缴武器。上述一系列原因导致这项计划最终搁浅。目前只有“库尔德自由战士”(Peshmerga)被成功整编至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的安全部队。^③ 什叶派民兵的整编和复员问题遗留至今,依旧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和社会合法性。

可见,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制定长期规划以及各个民兵组织可以接受的复员条款,使其自愿重返社会。当然,如若各方互不信任,则需要一个中间仲裁者来监督执行。^④

(三) “人民动员部队”参与重建与什叶派民兵复兴

2014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大肆扩张打乱了什叶派民兵的整编计划,威胁伊拉克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在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和伊朗的支持下,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及其他武装团体共同组成“人民动员部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Al-Quds Force)的帮助下,“人民动员部队”迅速壮大,接管并填补了伊拉克军方的势力空缺。但是,在大范围消灭“伊斯兰国”组织后,“人民动员部队”缺乏明确的角色定位。

从政治合法性来看,“人民动员部队”建立之初即得到各方支持,由中央政府支付薪金、危险津贴和食品津贴。^⑤ 阿巴迪政府也曾试图拉拢、依靠什叶派民兵力量组建伊拉克国民卫队。^⑥ 2017 年 11 月 26 日,巴格达通过法案正式将“人民动员部队”列为国家武装部队的一部分,否认其为伊朗代理人。^⑦ 2018 年 3 月 8 日,什

①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Order Number 91 Regulation of Armed Forces and Militias Within Iraq, June 7, 2004, pp. 9-10; Paul Bremer and McConnell Matthew, *My Year in Iraq: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Future of Hope*, pp. 385-386.

② Thomas S. Mowle, “Iraq’s Militia Problem,” pp. 48-49.

③ *Law of Administration for the State of Iraq for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rticle 54, March 8, 2004, http://gipi.org/wp-content/uploads/2009/01/transition_admin_law.pdf, 上网时间:2021 年 12 月 5 日。

④ Thomas S. Mowle, “Iraq’s Militia Problem,” p. 55.

⑤ Kirk H. Sowell, “The Rise of Iraq’s Militia State”.

⑥ 朱泉钢:《论伊拉克国家重建中的军队问题》,第 100 页。

⑦ “Iraq Rebuffs Tillerson Call to Disband Iran-backed Militias,” *BBC*, October 23, 2017,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41721565>, 上网时间:2020 年 7 月 12 日。

叶派民兵组织被正式编入国家安全部队,享受与正式军队同等的权利和薪水。^①

从外交作用而言,“人民动员部队”背靠伊朗,成为最主要的亲伊朗什叶派团体,将伊朗的利益和影响力最大化延展。2019 年美伊冲突急剧升级后,“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坚持反美、反以立场,煽动群众抗议,将美国视为阻碍伊拉克社会安全与国家统一的隐患,^②要求其撤出伊拉克,俨然成为伊朗干涉伊拉克事务、对抗美国的“代理人”。尽管“人民动员部队”属下部分什叶派民兵组织在国家机构之外运作,无视政府权威,致使巴格达外交处境尴尬。但反过来说,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却不失为巴格达政府实现外交平衡的“翘板”。2017 年 10 月,为平衡各方力量,伊拉克政府拒绝了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提出的“解散伊朗支持的准军事部队”的有关建议,给予“人民动员部队”与正规部队同等的权利。^③

从军事正当性考察,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行动开展后,大部分什叶派民兵拒绝卸下武器,一度脱离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军事辖制。激进派“真主党旅”继续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支持和培训,游走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④涉足叙利亚内战、也门冲突等地区问题,广泛参与“圣城旅”的海外行动,不受伊拉克安全部队的管控。该组织的副指挥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与“圣城旅”首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2019 年,特朗普政府将伊拉克“真主党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同列为“恐怖组织”,重点打击伊朗及其海外非常规军事力量。12 月下旬,美军空袭位于安巴尔省的一处“真主党旅”营地,双方爆发正面冲突。亲伊朗的什叶派反美分子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频频引发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诚然,“人民动员部队”影响力的长期存在挑战了中央政府权威,但激进什叶派民兵却是牵动伊拉克当前局势的一个不可控因素。

四、合法性权力整合：国家与什叶派民兵的互动前景

在伊朗海外战略的推动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阿拉

① Ako Rasheed, “Iraq’s Shi’ite Militias Formally Inducted into Security Forces,” *Reuters*, March 5,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iraqmilitias/iraqs-shiite-militias-formally-inducted-into-security-forcesidUSKCN1GK354>, 上网时间:2020 年 7 月 1 日。

② “Iraq Frees 14 PMU Forces Arrested in ‘US-Dictated’ Raid,” *Tasnim News Agency*, June 30, 2020.

③ Issam Saliba, “Iraq: Legislating the Status of the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Global Legal Monitor*, December 7, 2016.

④ Seth J. Frantzman, “Kataib Hezbollah in Iraq Says It Will Never Surrender Weapons,” *The Jerusalem Post*, June 30, 2020.

维派等各方势力迅速崛起,中东什叶派政治、军事力量实现了地区范围内的联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复员问题与“去伊朗化”相互交织,而什叶派民兵又是反对美国过度干涉伊拉克的正面角色。因此,对巴格达政府而言,整合什叶派民兵与平衡美伊博弈力量同等重要。实现什叶派民兵的“国家化”和“制度化”管理,首要是推动什叶派民兵融入国家正规军事编制,纳入国家统一领导;^①其次是准确评估什叶派民兵的具体情况,引导已然融入国家体系的民兵进一步政治化,有针对性地整合激进化的社会武装和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最后是在实现合法性权力转移的同时,逐步淡化什叶派民兵的教派底色,防止什叶派民兵问题扩大为国家间(两伊)矛盾。换言之,伊拉克政府要确保社会稳定以及在美国和伊朗间博弈力量平衡,以防陷入区域性动乱或代理人战争。

(一) 什叶派政党与民兵分离有助于整合

长期以来,伊拉克什叶派政党与民兵关系密切、利益勾连。什叶派民兵甚至可以通过政党控制政府部门,转而成为政府官员和国家安全部门的成员,国家武装和政党武装时常难以区分。^② 萨德尔运动和伊委会掌权之初在党政军关键部门安插亲族、培养亲信和蓄养民兵,“以党带兵”接管政府部门。长期来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在军政“两界通吃”的模式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整合进程。

然而,随着什叶派执政联盟的多样化发展,什叶派政党与其民兵间的关系逐渐松动并走向分裂。2009年8月,伊委会领导人阿卜杜拉·阿齐兹·哈基姆病逝,其子阿马尔·哈基姆(Ammar al-Hakim)继任伊委会领导人。阿马尔不仅政治威望远不及其父,他提出的“权力下放”政策更是触发了温和派与强硬派累积已久的矛盾。^③ 温和派随即转向民族主义阵营,^④巴德尔组织也倒向伊朗、脱离哈基姆家族的掌控,并于2012年正式独立。此外,萨德尔运动与强硬派马赫迪军队分道扬镳。^⑤ 2008年,萨德尔运动因马赫迪军队的暴力活动形象受损,遭到马利基政府打击。萨德尔被迫将马赫迪军改组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⑥清除了许

① 朱泉钢:《论伊拉克国家重建中的军队问题》,第102页。

② 汪波:《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政党政治发展》,第8页。

③ Benjamin Isakhan and Peter E. Mulherin, “Shi'i Division over the Iraqi State: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7, No. 3, 2020, pp. 362-363.

④ 萨德尔领导萨德尔运动和哈基姆率领的民族智慧运动共同组成民族主义联盟。参见《伊拉克国家概况(最近更新:2021年8月)》,中国外交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48/1206x0_677150/, 上网时间:2021年3月12日。

⑤ Leslie Bayless, “Who is Muqtada al-Sadr?,”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5, Issue 2, 2012.

⑥ 萨德尔新组织的非暴力组织名为“铺路者”(Mumahidun)。参见 Babak Rahimi, “The Mumahidun: Muqtada al-Sadr's New Militia,” *Terrorism Monitor*, Vol. 6, Issue 17, 2008, p. 1.

多以马赫迪军名义活动的犯罪团伙和激进分子。^① 2017 年,萨德尔为打造伊拉克民族主义政治路线,解散了马赫迪军。

分裂后的什叶派政党与民兵各自重组政治联盟。2010 年 3 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什叶派团结联盟内部发生分裂。哈基姆率领的“民族智慧运动”(National Wisdom Movement)和萨德尔运动联合其他主要什叶派力量组建的“伊拉克民族联盟”(Iraqi National Alliance),与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State of Law Coalition)展开竞争。以哈迪·阿米里(Hadi Amiri)为核心的巴德尔组织继续接受伊朗支持,与多个什叶派民兵联合组建独立政党“法塔赫联盟”(Fatah Alliance),^②成为伊拉克第二大政治力量。2018 年 5 月的议会选举中,萨德尔运动与左翼力量伊拉克共产党等组成的“沙戎联盟”(Sairoon Coalition)赢得 329 个席位中的 54 席,^③远超其他竞选联盟,制衡“法塔赫联盟”。无党派人士卡迪米接任总理后与温和什叶派民兵组建竞选联盟,不仅意味着伊拉克朝着制度化政党体系迈进一步,^④也突出了什叶派民兵融入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趋势。

此外,激进什叶派民兵近年来也有所转变。其一,温和转向。2006 年 7 月,萨迪克·萨德尔的学生卡伊斯·哈扎利(Qais al-Khazali)正式组建“正义联盟”(Asaib Ahl al-Haq),成为伊拉克暴力反美的主力。^⑤ 2011 年 12 月美军撤出后,正义联盟宣布停止武装抵抗,开始融入伊拉克政治进程。其二,激进转向。“真主党旅”历来是亲伊朗的激进武装。2003 年 10 月开始与美军暴力对抗,于 2009 年 6 月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组织”。^⑥ 后“伊斯兰国”时代,“真主党旅”进一步倒向德黑兰,协助伊朗对抗美国地区势力。该组织虽然人数少,但对伊拉克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形势构成长期威胁,是整合与改造的重点对象。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raq's Civil War: The Sadrists and the Surge*, Middle East Report, No. 72, ICG, Baghdad, Damascus, Brussels, 2008, p. 8.

② “法塔赫联盟”由巴德尔组织的负责人阿米里领导,其中包括 18 个政治实体。参见 Ahmed Ali, *The Revival of the 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 Iraq Update, No. 28.,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July 16, 2013.

③ 王丽影、王林聪:《伊拉克国家重建困境的根源及出路》,第 104 页。

④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0 页。

⑤ 卡伊斯·哈扎利是“正义联盟”的创始人。该组织受伊朗圣城军的资助、武装和训练,既参与政治进程,也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开展活动,其目标是建立一支像黎巴嫩真主党一样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什叶派政治力量。参见 Sam Wyer, *The Resurgence of Asa'ib Ahl Al-Haq*, Middle East Security Report, No. 7, The Institute for Study of War, December 2012, p. 10.

⑥ Bill Roggio, “Coalition Force Capture Hezbollah Brigades Operative in Baghdad,” *The Long War Journal*, July 31, 2008.

(二) 合法性权力集中与社会稳定相协调

什叶派政党及其民兵建立的前提是以什叶派伊斯兰运动为基础,但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拥有不同的群众基础。^①加之国家缺乏制度化的政党政治基础,^②整合过程缓慢。因此,政府在整合什叶派民兵合法性权力时不得不面临权力集中和有效治理的双重挑战。

其一,国家调整什叶派民兵的合法性权力,但防止矫枉过正。什叶派民兵在参与十多年的教派政治斗争中融入国家政治议程,基本与国家利益相协调。从2013年起,萨德尔重返社会,不再按照宗派路线展开政治运动。^③他不仅坚定反美立场,还批评政治腐败、督促政府全面改革,与逊尼派接触。2014年,萨德尔为证明自己的政治决心,将马赫迪军更名为“和平旅”,并派遣约2万名什叶派武装人员打击“伊斯兰国”,寻求成为巴格达的核心政治力量之一。2016年4月30日,巴格达“绿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以萨德尔的支持者为主,他们要求政府施行全面改革、严惩腐败分子。但是,过度的政治抗议也造成了不良影响。2019年12月初,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迫使总理马赫迪在任内辞职,政府“停摆”一年有余。

其二,政府推动什叶派民兵融入社会,同时须扮演好替代性角色。什叶派民兵服务于民间社会,长期受什叶派民众支持,从中吸纳新成员,双方保持长久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国家整合民兵的社会合法性只能通过提供更为优质的社会服务和安全保障以取代民兵。届时,做好民兵重返社会的长期规划,提高就业安置率、响应公共需求、扩大民主空间、减少腐败以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总之,兼顾权力集中与社会稳定需要政府制定更为稳妥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激进什叶派民兵势力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财政和武力支持,整合成功的前景并不乐观。

(三) 什叶派民兵整合与外交再平衡

伊拉克战争以来,什叶派占据政治主导地位,为伊朗主导下的“什叶派新月”补充了最为牢靠的一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长期受德黑兰的宗教宣传、财力资助、军事指导、武装训练以及信息系统共享等支持。截至目前,绝大多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仍与伊朗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伊委会的领导层经常往返于德黑

^① 伊斯兰达瓦党、萨德尔运动和伊委会是伊拉克三大主要的什叶派政治伊斯兰力量,且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巴基尔·萨德尔的思想遗产。在现实实践中,萨德尔运动与伊委会不仅政治龃龉不断,而且两大家族分歧严重,直接影响着党派关系的发展。参见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第143-147页。

^②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70页。

^③ Ibrahim Al-Marashi, “Iraq: The Reinvention of Muqtada al-Sadr,” *Al Jazeera*, March 9, 2016.

兰和巴格达之间,巴德尔组织的许多行动带有明显的伊朗烙印。例如,同时供职于巴德尔组织和“圣城旅”的阿布·穆斯塔法·希巴尼(Abu Mustaf al-Sheibani)经营的一个走私网络负责向伊委会输送先进武器。^① 尽管萨德尔运动与伊朗之间敌意浓厚,但萨德尔党人也需要充足的资金以扩大影响力,他们时常绕过领导层获取伊朗的现代化武器和资金。目前,在美国和沙特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与伊朗对伊拉克的争夺势头下,伊拉克政府推进什叶派民兵合法性的整合势必要平衡教派和国家利益。

第一,继续发挥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的凝聚力,抑制伊朗什叶派伊斯兰主义的渗透。^②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民族上属于阿拉伯人,政治上认同伊拉克民族国家。1991年,伊拉克什叶派大起义遭到萨达姆政府的疯狂镇压,伊朗表现出漠视态度促使伊拉克什叶派阿拉伯人放弃追随伊朗及其伊斯兰革命,更加认同其阿拉伯民族属性。^③ 伊拉克战争后,伊革委和巴德尔组织在政治上与伊朗“划清界限”。曾受“圣城旅”培训、武器和资金支持的萨德尔运动及马赫迪军^④以伊拉克的主权和独立为目标,表示将与伊朗保持距离。现在,尽管巴德尔组织和萨德尔运动的部分军队仍受伊朗资助,但舆论压力迫使其审慎对待这一关系,努力维系政治形象。

第二,伊拉克政府借助美伊博弈力量的平衡,缓解外交压力。伊朗基本的战略是维持伊拉克的政治稳定、拓展地区活动空间,同时消耗美国的军事力量,减轻伊朗外交压力。美国在伊拉克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稳定、改善治理和降低伊朗的影响力。2019年,特朗普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敲打伊朗海外军事活动。美国将“真主党旅”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同列为“恐怖组织”,并制裁重要的民兵头目和军事官员,直接刺激了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的暴力反击,^⑤双方在海外的非正规武装力量博弈力度加大。2020年初,美国“定点清楚”苏莱曼尼和穆罕迪斯意在限制伊朗海外军事力量的投射和影响网络。目前来看,美方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打击主要是回应亲伊朗派民兵对美国使馆的冲击,但后续的军事投入和打击决心还是高度存疑的。

① Joseph Felter and Brian Fishman, *Iranian Strategy in Iraq*, West Point: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October 13, 2008, p. 37.

② 岳汉景:《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评述》,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4期,第125页。

③ 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第89页。

④ F. W. Kagan, A. K. Majidyar, D. P. and M. C. Sullivan, *Iranian Influence in the Levant, Egypt, Iraq, and Afghanista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2012, pp. 15-18.

⑤ Alex Horton, “Soleimani’s Legacy: The Gruesome, Advanced IEDs That Haunted U. S. Troops in Iraq,”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 2020.

第三,合理利用激进什叶派民兵的行动建构政治话语,拓展外交空间。随着“人民动员部队”组建,以伊朗为代表的外来势力进一步介入伊拉克。^①大量受伊朗“遥控”的什叶派民兵和激进武装力量参与什叶派地区行动,甚至脱离巴格达政府的辖制,成为事实上的“法外之民”。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什叶派政党一方面严厉批评伊朗干涉伊拉克的行为,另一方面恢复沙伊外交关系。2017年7月,巴格达领导人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面,寻求经贸合作和重建资金支持。此外,在2019年至2020年的示威活动中,伊拉克民众反伊朗、反美情绪日益高涨,给卡迪米政府运营外交关系创造了舆论条件。

2020年5月,卡迪米作为调和伊拉克国内各派和美伊关系较为理想的人选,借势提出将整顿激进组织、遏制和削弱破坏稳定的民兵势力作为施政重心,表示将重整国家权力和政府治理能力,实现“所有部队归国家”,解散或者收编各支民兵即为首要任务。^②军事上依赖安全部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整编国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团体,承诺加强边境管控和打击跨国恐怖活动;政治上靠近美国,关键问题上考虑美国的战略利益;经济上依赖伊朗,与伊朗代理人搞好关系。同时,新政府领导的国家情报部门与伊朗、美国均有深度合作,体现了现阶段伊拉克政治外交的多面特性。

五、结论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并时常为教派主义政治话语所裹挟。西方也曾尝试将什叶派民兵及其领导人排除在伊拉克政治体制之外,但现实往往南辕北辙。

首先,“处于现代化政治体系中的政党在提供合法性与稳定性方面有着重要意义。”^③中东威权政府的统治往往依托强有力的政党。克里斯玛型领袖萨达姆及其复兴党在短期内崩塌后,什叶派纵然政党组织林立,但都缺乏组织化、制度化的政党来衔接西方植入的“民主”,而且什叶派政党内部分歧严重,凝聚力不足。战后初期,伊拉克新政府调和部落团体、宗教派系和域内外大国利益的能力有限。而巴德尔组织和马赫迪军等什叶派民兵的出现“填补”国家剧烈转型时期的政治真空,为什叶派政党体系的完善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但当什叶派政府发

^① Riccardo Redaelli, “The Osmotic Path: The PMU and The Iraqi State,”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October 30, 2018, <https://carnegie-mec.org/2018/10/30/osmotic-path-pmu-and-iraqi-state-pub-77600>, 2020-09-19, 上网时间:2020年10月12日。

^② 唐恬波:《伊拉克新总理卡迪米上位前后》,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第51页。

^③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69页。

展到一定的政党化和制度化阶段,什叶派民兵与政府的关系则由“相互赋权”转为合法性权力竞争。

其次,经过复兴社会党三十多年的运作,伊拉克已然形成了体系化的威权政治和严密的军政系统。^①战后,联军解散伊拉克国家军队,实施全面的“去复兴党化”政策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新政府的军队和安全部门在应对国内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时有效性欠缺。“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后对伊拉克领土攻城略地,以“人民动员部队”为首的民兵组织表现出了更加优秀的作战能力,至今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质而言之,目前伊拉克国家军队建设尚待完善、军队制度化程度较低,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扶持。因此,倚重、收编什叶派民兵力量,一方面加速安全重建,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伊拉克政府有效统一国内武装力量、抵御内乱外敌的现实选择。

再次,尽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可以自由运作,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和动员能力。但其自身发展过程暴露了中东民兵组织一个根本性弱点:即使它们可以获取强大的民意基础,但频繁的暴力行为和极端倾向暴露了其合法性的致命缺陷。伊委会和萨德尔运动不仅招揽什叶派战士对抗逊尼派,而且从宗派暴力中牟利,这些损害民众和国家利益的行为使得什叶派民兵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大打折扣。什叶派民兵推行严格的什叶派伊斯兰教义,引发了诸多不满。上述缺陷恰恰是国家整合什叶派民兵的有效突破口。

总而言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长期所依赖的“合法性”仅仅适合于社会动荡和政治脆弱时期。当国家重建步入稳定阶段后,长期分摊国家最高权威的民兵组织势必成为整合的对象。换言之,民众最终认可的不是个别民兵组织或者威权领导人,而是拥有强大安全保障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国家政府。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

^① 朱泉钢:《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以埃及、伊拉克、也门、黎巴嫩等共和制国家为例》,第 119-125 页。